

的挫折，同1930年以後取得的成就進行對比，說明國民黨政權在地方社會中影響的深入。但清查「黑地」過程中出現的諸如鄉公所敷衍了事等新情況，又說明獲鹿鄉村內部強大的凝聚力，國民政府試圖通過鄉村重組向下延伸勢力的效果並不顯著。

以上分析表明，作者對獲鹿地區的研究開創了許多關於華北鄉村問題研究的新思路，特別是在中國鄉村政治進程中，獲鹿鄉村舊制度和舊觀念的連續性、制度層面和話語層面的變化性兩方面的研究，無疑給有關華北鄉村問題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。

難以撥開的歷史迷霧

● 馬學磊

三十多年來，大家不斷詮釋「林彪事件」，然而資料的缺乏始終是一個難以擺脫的事實。舒雲通過採訪事件的當事者和家人，用他們的回憶資料作為解讀此事的根據。



舒雲：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》，上、下冊（香港：明鏡出版社，2007）。

「林彪事件」，又稱「九一三事件」，在中共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都是一件大事，一個國家的「二號人物」、黨的副主席突然潛逃，結果機毀人亡，而當局對此事

的處理卻是如此草率，任何一個知道此事的人都會感到一頭霧水，因為此事疑點實在太多。事情過去那麼多年了，儘管已經有很多人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，但還是沒能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。2007年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了《林彪事件完整調查》（引用只註頁碼）一書，作者舒雲花費二十多年的時間，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和知情者撰寫而成。細讀之後，頓覺對此事了解突增，然仔細回味，卻更覺迷茫，因為作者提出了許多問題，但是，對於這些問題又未能給出合理的解釋，以致帶來更多懸念。

作為解釋「林彪事件」的新作，此書優點眾多。首先，本書資料非常豐富。「林彪事件」疑案重重，檔案資料非常缺乏。對於這一事件，中央一直用一種單一的說法，那就是林彪叛逃出國。但是，事實真相如何？三十多年來，大家不斷詮釋，然而資料的缺乏始終是一個難以擺脫的事實。作為一位記者，舒

雲通過採訪事件的當事者和家人，用他們的回憶資料作為解讀這一事件的根據。作者的採訪對象，上至共和國的將軍，下至「林案」受牽連者的家屬，包括前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、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、毛家灣警衛負責人劉吉純、林彪女兒林豆豆、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、前空軍司令員吳法憲、林彪秘書關光烈和于運深、江青秘書閻長貴、周恩來的保健醫生張佐良、孫毅將軍、王光美、陳勵耘等。作者用他們的回憶去解讀這一事件，在對很多事情的理解上，取得了一定的進展。

其次，作者運用了獨特的考察歷史事件的方式。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：第一，完整的考察事件的思路。本書講述的是「林彪事件」，但是作者並沒有僅僅局限於這一事件本身，而是在敘述本事件的過程中，穿插了事件之前的種種矛盾，特別是毛、林之間矛盾的產生。本是親密的戰友、革命的師生，然而兩人最終卻成為敵人，到了必有一方死亡的地步。同時，本書詳細分析了葉群和林立果在此事中的作用。這樣的敘述風格，給人一種完整的感覺，使人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，真正印證了書名中的「完整」兩字。

第二，作者排除了傳統分析「林彪事件」的方式。以往歷史學者總是將「林彪事件」或者按時間順序，或者按專題的順序進行撰寫。作者雖未能擺脫專題的順序這一套路，但在此之外，作者又把同時發生的事情整合到一起進行比照印證，在這種比照中，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浮現於水面。例如，在敘述毛澤東南巡時，作者一邊講述毛澤

東南巡路上所說的話、所做的事，一邊敘述林立果一夥的所作所為。兩者比照敘述，相互呼應，使人們能夠很好地了解雙方。

再次，作者在此書中提出了許多疑惑，並試着進行分析，儘管並沒有得出非常肯定的答案，但是許多地方引發的思考是值得肯定的。筆者現就本書中幾點思考敘述一下。

第一，林彪是否想奪權？官方一直宣傳正是在林彪的直接指導下，葉群和林立果等人才做出奪權之事。「1969年，林彪已不再沉默寡語了。『軍隊的權力就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』；『不要把權交給別人……』」（蕭思科：《超級審判——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親歷記》，上部〔濟南：濟南出版社，1992〕，頁96），這就是對林彪的宣傳。可是，究竟林彪是不是想奪權呢？眾所周知，林彪晚年身體極度不好，他怕光、怕水、怕風，每天只聽半個小時的報告，其餘時間就在黑暗的屋中靜坐。這樣一個人，他會奪權嗎？他做上了「第一號人物」又能怎樣呢？在本書中，作者分析了這件事，她認為想奪權的不是林彪，而是葉群和林立果。此時的林彪，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聽命於他們二人。作者舉例對此情況進行說明。1968年，林彪等人去井岡山，程世清邀請他們去南昌，林彪答應了，可葉群害怕因此事而與江青關係再度惡化，所以在飛機飛行方向上做了手腳，林彪知道後雖然很生氣，但也只能聽她的安排，回到了北戴河（頁650-53）。從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出葉群對林彪的干預程度。作者認為奪權之事也可能是葉群和林立果假借林彪之手所做。這一推測不

本書講述的是「林彪事件」，但是作者並沒有僅僅局限於這一事件本身，而是在敘述本事件的過程中，穿插了事件之前的種種矛盾，特別是毛、林之間矛盾的產生。

閱讀本書，讀者不會很吃力，因為它有很強的趣味性，就像一個個的故事。但是缺少史學家的思維，也就削弱了作者的邏輯推理能力，使有些事件敘述得不很嚴謹。

無道理。當然，這只是推測，真憑實據很難拿出來。

第二，人們後來判定林彪是出國叛逃，主要是根據其警衛參謀李文普的交代。李文普說，在汽車開往機場的路上，林彪問：「伊爾庫茨克有多遠？」(頁674)林彪曾經到過蘇聯，並且經過了伊爾庫茨克，怎麼會問這樣幼稚的問題呢？而且李文普說自己被林立果打了一槍，可事後林豆豆的未婚夫(外科醫生)卻看出李文普是自傷。本來這件事是很容易查清的，因為「大紅旗」汽車留在了機場，只要檢查那兩個槍口就可以很清楚了。可是，中央並沒有查，而且對李文普的處置也很輕。但是對於黃永勝的警衛參謀費四金卻不是這樣，指他不配合當時的審查，沒有適時揭發黃永勝的「陰謀」，結果被關押了四年。論「罪惡」，李文普與費四金不相上下，可為甚麼結果卻如此不同呢？原因很簡單，那就是李文普在這件事上立了功，而費四金卻沒有「作為」。當時的中央對於只要有利於證明林彪叛逃的言論，不加分辨就會採用，只要符合中央的意思就行了。「林彪事件」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，有必要慎重地思考、研究此事，以求還歷史本來面目。

第三，作者對作為揭發林彪反黨叛國最重要證據的〈五七一工程紀要〉產生了懷疑，因為這個文件是在極其明顯的地方發現的。在林立果離開時，已經對活動地點進行了清理工作。但是，這麼重要的文件怎麼沒有被拿走或者毀掉？人們後來一再以此文件證明林彪集團的反黨叛國，可是卻從沒仔細思考它被發現的過程。對於這種證據，中

央怎麼能不考察呢？實在有點不可思議。

「林彪事件」一直是一個未解開的謎，依靠今天的資料難以揭開其面紗。本書努力探討事實真相，但由於種種限制，白璧並非無瑕。

首先，記者身份有利於作者收集資料，但也帶來了不便。第一，作者注重採訪資料，但這些採訪資料有一定的局限性。既然是參與者的回憶，就難避主觀性。即使被採訪者回憶得非常客觀，但是，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了，對於當年的記憶，難免有不實之處。在本書中，有些地方就顯示了這一點，例如對於墜機後的大火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憶，採用哪一個直接關係到本書的結論。作者沒有仔細分辨這些資料，就把它們拿來運用，以至於影響了本書的質量。第二，作為記者，而不是歷史研究者，這樣就造成作者在運用這些資料時，沒有甚麼選擇性。歷史研究者與記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：記者注重把自己掌握的資料，不管運用甚麼方式，只要把他們羅列出來就可以了；而歷史研究者注重運用技巧，把他掌握的資料和要論述的問題結合起來。閱讀本書，讀者不會很吃力，因為它有很強的趣味性，就像一個個的故事。但是，缺少史學家的思維，也就削弱了作者的邏輯推理能力，使有些事件敘述得不很嚴謹。

其次，本書提出許多問題，但是結果仍是迷霧重重。「林彪事件」一直以來就存在很多疑點，很多人想給出答案，但是都沒有成功。舒雲在這本書中，也進行了如此的嘗試，她提到了三十多個疑點，並試着運用自己掌握的資料，想要給出

合理的解釋。但是，最終卻沒能實現這一願望，因為問題提了一大堆，卻沒能解決甚麼，還是把一大堆疑問留給了讀者。許多人對本書給予了高度評價，認為它解決了「林彪事件」的很多問題，筆者認為此評價過高，與此書的實際價值不符。

再次，就中國大陸而言，「文革」一直是個研究的禁區。在文革結束的初期，出現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，其中，有些部分涉及到了「林彪事件」。但是，這些著作基本上是官方的調子，有點為尊者諱的意思。近幾年來，港台等地出版了一些關於文革和「林彪事件」的書，在這些書中，破除了中國大陸官方的某些限制，澄清了一些事情。但是為了符合大眾的口味，一些著作對有些資料過份解讀，以至於有點牽強附會，本書也有如此嫌疑。

例如在本書中提到兩個重要人物：汪東興和李偉信。依據作者的推測，他們都做了毛澤東懲治林彪的棋子。在九屆二中全會上，汪東興跳出來，發起對張春橋的攻擊，在他的領導下，葉群、陳伯達和林彪的「四大金剛」才圍攻張春橋，結果造成毛澤東對他們的不滿，汪東興五遍檢討通過了，可他們幾個和林彪就慘了。同樣，毛澤東南巡，林立果制訂暗殺毛的計劃，結果每個計劃都失敗了，好像毛在他們身邊安插了奸細一樣，否則毛怎能事事料定如神呢？於是作者就把目標放在了李偉信身上。作者的種種推測，有一定的可信度。但是，文革是一個非常時期，在那個年代，很多事情難以用常理推理。毛也許並不是有意利用他們，只是無意之間，他們充當了這樣一個角色。而

對毛在南巡中一些潛在的危險，是防衛人員應該想到的，比如油庫，林立果一夥就能想到去炸它，當了毛那麼多年警衛的人員能不想到嗎？所以，我們不應該只是停留在無端的聯想。

最後，本書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處。作者運用資料時，不注意鑒別真偽，以至於造成有些地方難以自圓其說。例如：作者提出了兩份林彪手令的問題，並認為這是她的最大發現。的確，假如真的存在兩份手令，那麼這逃跑的陰謀與林彪的關係就不大了。他不會寫兩份橫、豎不同的手令。作者對此事的推測有合理之處，繼續探討這個問題也是應該的。作者為證明林立果手持的兩份林彪手令為偽造，曾說：「『文革』後林彪幾乎很少動筆，文件圈閱也常常由秘書代筆」（頁457），僅僅過了兩頁，作者為了證明很多人都可以偽造林彪筆迹，引用了1964年調至林辦當秘書的于運深的話說：「我在林辦七年，見過林彪寫字多了。林彪高興時，『哄』他寫個條子很容易。」（頁459）很顯然，這兩處論述是有些矛盾的，它們是不是作者觀點先行的產物呢？看起來很像，無論如何，這直接讓人對作者在其他地方的論述產生懷疑。

王年一在為此書撰寫的〈序言〉中說道：「我們無權也無心為林彪平反，我們卻有權呼籲大家來關注這件大事。我們追求的是公平和正義」（〈序言〉，頁17）。王年一說的「無權」，這的確是事實，作為知識份子、歷史研究者，是沒有甚麼權力為任何事件平反的。但是說「無心」，這就有點讓人不明白了。我們研究歷史的目的究竟是甚麼？我

近幾年來，港台等地出版了一些關於文革和「林彪事件」的書，澄清了一些事情。但是為了符合大眾的口味，一些著作對有些資料過份解讀，以至於有點牽強附會。這本書也有如此嫌疑。

們要尋求公平和正義，當我們真正能夠揭示歷史的真實時，歷史的冤案我們也要敢於澄清，只有這樣，才能真正擔當起一名知識份子的責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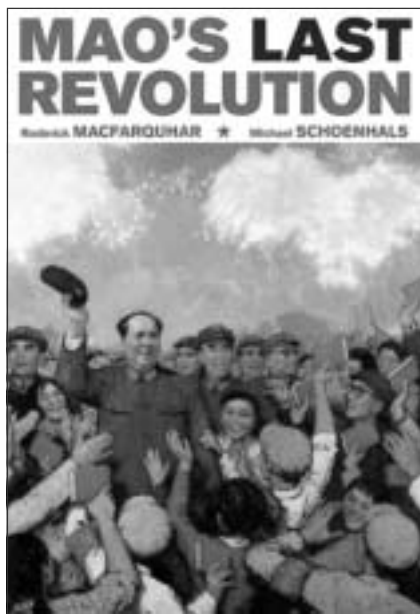
「林彪事件」真正能夠研究清楚，做到還歷史的本來面目，需要檔案資料的大量開放和黑匣子的成功解密。但是，檔案資料的開放是很難的，而且即使開放了，檔案資料曾否被篡改也難以確定；何況黑

匣子現在更不知身在何處。所以，這一事件的澄清看來會遙遙無期。但是，我們不能因此便放棄對它的研究。我們還要在資料不斷豐富的基礎上，站在公正的立場上，繼續探索。舒雲的這本著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儘管有這樣那樣的不足，但是作者畢竟豐富了資料，而且提供了研究的新方法，開闊了研究的視野，對於這一事件的進一步研究，還是有一定作用的。

文革精英政治研究的權威之作

● 夏亞峰

西方學者對文革的研究始於文革初期，當時主要依據的是在西方可獲得的中國政府文件，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是「毛澤東為甚麼要摧毀他親自創建的黨和國家機器？」



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, *Mao's Last Revolution* (Cambridge, MA: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).

西方研究中國文化大革命最有影響的兩位學者馬若德 (Roderick MacFarquhar) 和沈邁克 (Michael Schoenhals) 合著了一部當今最權威的研究文化大革命 (1966-1976) 的通史性著作——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》 (*Mao's Last Revolution*，引用只註頁碼)，該書於文革四十周年的2006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。這是一部有關文革的全史，從文革開始前夜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《海瑞罷官》到1976年10月粉碎「四人幫」宣告文革正式結束為止。馬若德曾任英國廣播公司 (BBC) 國際政治記者、英國國會議員，現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。沈邁克是瑞典的中國問題專家，現任瑞典隆德大學 (Lund University) 教授。

1986年，高舉和嚴家其共同出版了《「文化大革命」十年史：1966-